

长江文艺出版社

陈应松 著

大街上的水手



KUASHIJI
WENCONG

大街上的水手

陈应松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街上的水手/陈应松 著

(跨世纪文丛;第 6 辑/陈骏涛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54-1876-7

I . 大…

II . 陈…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491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 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4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54-1876-7/I·1437 定价:14.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陈应松，男，1956年1月生于湖北公安县。祖籍江西余干。当过知青、工人、农民、文化馆辅导干部、编辑，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创作、发表和出版小说、诗歌、散文作品350万字10多部。曾多次获奖。并有诗、小说翻译在境外发表及连载。现为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一级作家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责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疼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返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3)
沉住气! (1)	
乌鸦	(41)
剪彩	(47)
承受	(54)
一个,一个,和另一个	(88)
犧羊	(96)
草荒	(135)
大寒立碑	(171)
归去来兮	(205)
大街上的水手	(234)
洪水六记	(274)
跋:与语言和灵魂之灾搏斗	
——陈应松访谈录	樊星(306)
附录:陈应松主要作品目录	(320)

沉 住 气!

我的母亲是一个绝对虔诚的佛教徒。每天早晚在家里的佛像前点香献净水，合掌恭敬，跪膝大拜。为此，我弟给她经常买乐百氏矿泉水，以献给三宝。在她的口中，常念的就是南无十方常住三宝，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我的母亲在长江上游的某一个江滩上种菜，当她得知我血压升高，胆囊发炎，便在庙里找和尚算了一命，然后在和尚的指点下，为我放了两条红鲤鱼的生。

我的母亲走近长江边，她弯下腰，对着滚滚的江水往下游默想着自己的儿子，口中念着菩萨保佑，从木桶里捉出两条大红鲤来，将它们一一放入水中。两条红鲤摇头摆尾地游入了长江，它们红色的背脊和尾鳍消失时，我的母亲伸起腰来，如释重负，双手作揖。在粼粼的波光中她看见了那天的朝霞，满天飞舞，全映进她的眼里，她眼中的霞云，瞬间全幻化成她放生的红鲤，都出现在东边的天空上，它们呷浪嬉戏，红鳞如锦。我的母亲说她看到了佛的显圣。佛知道了她的诚心。

我的母亲在电话里这样说话时严厉批评了我的不信，她说只有信佛的人才有福。她相信因果报应。她说咱们村的五扣你知道吧，辱骂菩萨，邻居的牛啃了他的庄稼，硬是生生地用绳索

把那牛的舌头勒断了，结果生了两个女儿都是哑巴。前年生的一个儿子，到现在还不能说话。估计又是个哑巴。

我知道这是母爱，如果母爱也是佛爱的话，我信佛。

于是晚饭后，我总爱到二里开外的江边去散步。我和我的老婆沿着防洪墙走着，或者在观水台看看，当水退去时我们也走下江坡，坐在锚链上，看水，看船，看江鸥。当然，我也想能看见那两条从上游游来的红鲤，母亲为我放生的红鲤，出现在水中。我想它们一定游来了吧，它们一定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水域，保佑我，使我免遭病痛之苦。

这一天，我和我的老婆又来到了江边。这一天，白昼的光芒似乎迟迟不肯散去。这一天已经进入了秋水伊人的时候，江水渐渐变清变浅了，但风却依然温热多情，吹在身上和街道上，吹在行人的笑意里，使人觉得这个傍晚的光景是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许多的人骑在防洪墙上，平心静气地看着江面与天空。水边，一些船家正在聊天、吃饭，孩子们在岸上和跳板上窜来窜去。这都是些七八岁的孩子，他们调皮、机灵，让人生厌。有几个闲人在趸船上钓鱼。

对钓鱼的人我是分外注意的，我想起那两条与我有关的红鲤。就是这两条红鲤，把我与长江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我爱她，我为她歌唱，歌唱她奔腾的大水养育着无数的鱼鳖，她用巨大的胸怀盛着它们——放生的鱼，放生的龟，盛满着这世上为生死病痛困扰的俗人的希望，这愚钝凡夫深重的罪业，并与佛一起，发无边的愿力与慈悲，警醒他们，劝戒他们别在刀上舔蜜，然后行善宁心，得到福寿安康。

我注意钓鱼人，我忐忑不安，惟恐他们的钓尖上出现一条红色的猎物。

这一天，我正准备穿过一个豁口到趸船边去看人钓鱼，结果发现了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薛羔，我的老婆也发现了她的同事郭玲。郭玲是薛羔刚悄悄结婚的老婆。我们没准备与他们说话，因为我的老婆十分讨厌郭玲，可以说，她们是那种见面亲热而背地里恨不得把对方撕成碎片的死对头。这种同事关系，在我们的社会屡见不鲜，每个单位都不少。而且总是在一个单位就会发生这种暗暗的仇恨；有时一个人（男或女）还不止发生一个仇恨，会同时让十个二十个对他（她）恨之入骨。面对着这么多仇恨，如果没有法律或宗教带给人的道德约束，这样的人肯定会被捣成肉酱。

但是被恨的和恨人的都生活得很好。

仇恨像核武器，可以造成相对的平衡。难怪人人都想拥有它的。

这一天，我不知道红鲤鱼与薛羔夫妇有什么联系。这一个傍晚简直明亮得像正午，我们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薛羔夫妇制造了一起惨案。作为目击者，我必须详细地把它记录下来。

薛羔的老婆郭玲，那一天显得十分悠闲和可爱，她与薛羔手牵着手在江边用预制件铺成的斜坡上一边说话一边散步；薛羔不仅像十足的再婚者，而且还像是个偷情者，他显得比较老，神色不太自然，就是与自己的老婆在一起也是这个样子。有人形容他走路的姿势也像在性交。至于郭玲是怎么瞧上他，说不清楚。毕业于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郭玲以她一贯的洋洋自得的神态在江边出现后，我看到我的那位老婆就缩起了鼻子。“走走走走走，”我的老婆说话如放连珠炮，她是一个十分开朗的人，人缘相当好，谁都喜欢她，虽然她不过毕业于本市一所普通大学，但她依然很有才，我很欣赏她。但她见了郭玲却表现出一种相当不正常的心理。

她这么缩着鼻子我们就停住了。这时候，从趸船的跳板上跑下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我们以为他认识郭玲，郭玲也认识他呢。我们看到她跟郭玲拉拉扯扯，郭玲刚开始面带笑意，后来就不耐烦了，她推搡着那个男孩，想把他从自己身边赶开去。可那个男孩纠缠她。而薛羔在一旁似乎没有什么作为。薛羔戴着眼镜。

这么僵持着大约一两分钟，我们就看到那个男孩向后仰过去，不知是怎样郭玲倒提了他的脚，他已顺着较陡的斜坡滑下水去了，郭玲简直是把他塞进水里去的，这样，那个男孩就慢慢沉入了水里。

这个过程十分短暂，当男孩沉进水里后，大约有几个人都看到了。我看薛羔最先跳进水里，那地方竟然不是很深。薛羔穿着夹克，下身好像还有卫生裤。而郭玲也跳下了水去，在离岸不远的水里摸索。几乎在同时，有几个男人也跳下水去，在那块地方摸捞着那个男孩。但是那个男孩始终再没有出现。

也就在人们跳下水的那一刻，从趸船那边的一条船上跑过来了几个男女，有一个女人在紧张地叫唤着溺水孩子的名字，在周围焦急地走动，这个女人不是那溺水男孩的母亲。真正的母亲是在离发生事件的下游五十米左右的一条船上。那儿有许多船，连靠在一起。一个赤脚的女人从远处飞也似地奔来，神情恐怖，一看就是男孩的母亲。她哭喊着，她要跳下水去，被人拉住了。因为水下有许多男人正在施救。

岸上的那些恐慌而悲恸的情形吸引了我，再定眼看水下时，薛羔和他的老婆不见了，他们悄悄地溜了，趁混乱之机溜之乎也。我见没有了薛羔夫妇，才狂奔下去，跳进水里，参加了寻找小孩的行动。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突乎其来的惨剧之所以让我感

到惊心动魄，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溺水男孩穿着一件圆领的红色运动上衣。那团红色的火使我想到母亲放生的红鲤。我下水去摸索时，在眼前晃动的水里好像四处都分散着那些残红，被撕裂了，被水揉碎了，我预感到小孩肯定找不到了。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开始害怕水，那水里与我相关的两条红鲤。我害怕长江，我敬畏她，我与妻子江边的每天散步就犹如怕鬼的人总想听鬼故事一样。

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有人爬上岸来，有人还站在水里。这时，在下游五十多米那些船连泊在一起的地方，有人惊呼“这里！这里”。

都以为是从那个地方游出来了，许多人包括男孩的母亲都朝那儿跑去。他们又在那儿的水域鼓捣了一会，又一无所获。

此时警察就来了，人也愈聚愈多。警察走过防洪墙，走上趸船，许多人围着他们，男孩的母亲也被搀扶了过去，向警察哭诉着情况。

警察边听边看着水里，水里的几个人都在向警察摆手，意思大约是捞不到了，你们也别下来了，没用了。

我已经站在了岸边，全身除了头未湿外都是湿的，我浑身发抖，那暮色降临时的江风吹得人直想死过去。寒冷是十分可怕的，我刚看过《泰坦尼克号》，那些在冰海里死去的人，是寒冷加速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而死亡。

我的老婆架着我上了岸，我的老婆提着两双鞋子，一双是她的，一双是我的。我的老婆把眼镜给了我。这下，我看得更清楚了，特别看清楚的是两个警察，巡警。

“走，我们到那跟前去听听。”我指指巡警所站的地方。

“快走！快回。”我的老婆命令我说。

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远离是非的躲避决定。她不让我接触

警察。

我说：“有些情况不向他们说明白吗？”我瑟瑟发抖地在路上跟老婆说。

“沉住气！”我的老婆说。

在最幽暗的地方，路灯照不见的马路的边沿，我和老婆快速走着。这以后我们一路就没说一句话了，我们躲避着行人，因为这已不是游泳的季节，我们一男一女湿漉漉的身子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像看稀奇一样地盯着我们怪看。所以我们要躲开人，在人们还没有意会过来时就从他们眼里消失。

我们回到了家里，我们换衣。我们说的全是换衣和寒冷的事，说的是季节。我们像自己落水而其它事没发生一样。我们就钻到了被子里。

“为什么要沉住气？一条命啊。”我终于忍不住问她。

“行了吧，毛泽新！你又不是一个傻子。我还不知道你，你真的敢这么不假思索地去说出肇事者吗？毛泽新，你的智商可是比毛泽东的智商还要高啊！”我的老婆经常拿我跟毛主席对比来损我。其实我这“泽”字辈分与毛泽东没任何关系，我这个毛家祠堂也不是韶山的毛家祠堂。谁让我有这么个怪名字呢。“文化大革命”那阵我才读小学二年级，老师就强迫我改名字，改成了毛卫东。在全校大会上批判我说我企图什么什么。我有什么企图呢。现在我的老婆又经常借题发挥来咒骂我说“毛泽东都死了几十年了，你还活在世上”。其实老婆只要明白“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的道理，就会明白像我这种人顽强地活着，总是有一定原因的。

老婆讽刺了我一通，我彻底地蔫了，我没有话了。她点到我的要害处。

是啊，我真的敢吗？我真的不在脑海里绕十一个弯儿就

上前去给警察说那人我认识,是谁谁将小孩推到水里去的?

那个晚上,动荡而寒冷的水推拥着我,使我一夜都像睡在海船上一样,那个晚上有许多的喊声哭声,有许多撕碎的红色在水波间漾动,时起时伏。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薛羔家的窗子是黑的,等我迷迷糊糊被尿胀醒,在厕所里排泄时撩开窗帘,才看到了他家一点微弱的灯光。他的窗子对着我的窗子,当然是在另一栋了。而且对着我的两个窗子,一个卧室,一个厕所。不过他也是两个窗子,也是卧室加厕所。我小解时看见的那点灯光,是从卧室的窗子透出来的,证明他们很晚才回家。

我们单位住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坡上,那里靠近一个很有名气的楼阁,风景优美,静无人扰,没有车马喧嚣,连小偷都很少光顾。在这个小院里,住着单位的近百个职工和他(她)们的家属。薛羔的那栋房在我们上面,居高临下,若说监视的话,他可以很方便地监视我们——我想假如在江边出事之前和之后他们看见了我们,他们便会注意我们的动静了,假如他们不想去投案自首想隐瞒此事的话。

我说的我们这个百多人的小院可以互相监视,是有道理的。下山的路只有一条,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想进出这儿,不会有一个人后门供你方便,供你做地下工作。因此,对每一个人的行踪,所有的人都一清二楚。对每一个家庭里所发生的事,也一清二楚。因为这是一个研究机构,每个人都很少有外出的可能,一年三百六十天,大约都在这个院子里,吃喝拉撒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在家或办公室研究累了,出外散散步,也离不开院子,那简直是放风。一天里这些面色苍白的或者被香烟熏得发黑的人,迈着东倒西歪的步子,背着手,走到哪儿都是熟人,然

后互相问候，吃饭了吗，洗澡了吗？你的胃还疼吗？你丈母娘便秘的情况怎样？

在我们院子里，因为绿树成荫，苍苔是最多的，所以当我看到那些闭门不出而在某时出来去散步或在门房取信的人，他们的裤腿上似乎都泛上了苍苔，他们像一些年深月久的树，行走的树，会说话的古树，吐纳着苍苔的气息，可他们的研究（当然也包括我了）却是十分前卫的，紧迫的，生气勃勃的。

研究什么呢？研究乡镇企业。现在正式更名为“非国有经济研究所”。也研究比乡镇企业更先进更迅猛的民营企业了。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等着当天的报纸。报纸来了，我寻找着这件事是否见了报，我终于在18版左下角的地方找到了。这则消息要求肇事者尽快到派出所说清楚并接受必要的调查，不要存侥幸心理，而且呼吁知情人提供线索。报上说：“是一对年轻的男女，男的年龄稍大”，“有人亲眼见那女的把姓张的小孩推进江中”，“他们是往民主二路那边离开的”等等。

薛羔来上班了，我看他依然戴着眼镜，神色基本正常，也没有出现因睡眠不足而红肿的眼睛和疲倦的步子。我试着跟他讲了一句话，也许没讲，不是跟他一个人讲的。他在另一个办公室。我说的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光线都比较暗，我说的估计是关于树的话，关于树叶怎么还不落，而我们这个院子不应该种常绿植物，应该种落叶乔木，一年四季暗无天日，潮湿得人都要发霉了，每个人都出现了严重的近视。像我这种人，上溯三代没一个近视，兄弟姊妹也没有，到这个所里之后，眼睛就大江东去了。

我说树的话时薛羔也说了一句，因此我估计他当时没有发现我们夫妇，如果他们真知道我们在场，就会惊慌，想着如何防范我们，或者要找我们谈判了。